

1921年张元济之常熟行

陈福康

近年来，年谱和年谱长编之书出得真不少，但真正高水平的其实也并不多。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元济年谱长编》无疑是佼佼者。例如，1921年5月，张元济曾有常熟之游，这么一件小事，年谱作者也发掘了出来，在5月25日条下记有：

赴常熟。约为借照瞿氏铁琴铜剑楼书事。（1921年5月26日致张廷臣书，《全集》第2卷，第275页）

不像现在不少年谱，只知道记载谱主写信写文章，或只知大量抄书引文，连年谱不仅仅是记言更主要是纪事这一点都不晓得。不过，近日我偶尔翻阅常熟藏书家徐兆玮的《剑心簃日记》，发现《张元济年谱长编》的此一记载尚可补正充实。张元济应该是5月21日到常熟，24日离开常熟，同行还有商务印书馆同事高梦旦（及其儿子）和陈叔通，主要是旅游和访友，还参观了当地一个很不错的书画展览会。当年的交通条件远不能与现在相比，张元济他们往返是乘小轮船，因此25日才回到上海。

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倚虹、虹隐、棣秋生，别署剑心、剑心簃，书斋号虹隐楼。他与张元济同龄，但比张早三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次年恩科补行殿试，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学法政，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常熟参加地方事务，任常熟代理民政长。1912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员。曹锟贿选总统时，愤而归里。先后创办乡

校和图书馆，担任县水利局长，主持重修《常昭合志》。徐氏工诗古文，勤奋学习，颇富藏书，刊刻古籍甚多。著有《闰余集》《芙蓉庄红豆录》《虹隐楼随笔》等，仅日记留存即近三百册之多。他与同邑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氏父子为好友，一起创办常熟县图书馆。

1921年5月9日徐氏日记载：“（下午）二时，至图书馆议书画展览会陈列事。大雨如注，炊许稍止。乘藤桥[轿]归。”当时连日大雨成灾，这个书画展览会后来就办成了赈灾之展，可见徐氏等人之善德。而这个展览会展品质量之高，亦令人惊异。据19日徐氏日记：“昨日为助振[赈]书画展之第一日。据《常熟报》载，楼上分七室。第一室：铁琴铜剑楼之王石谷青绿《芳洲图》、墨山水《夏木垂阴图》、金笺墨山水，王、杨合璧竹鸟，王鉴墨山水，王麓台青绿山水二、又墨山水，王梦楼、刘石庵、汪退谷、张船山对联。第二室：铁琴铜剑楼之罗板牛木石，余曾三松鹤，邹一桂天竹、月季、兰花，许在野雀梅，马元驭鸣菊，王石谷墨山水，马远山水，蓝田叔雪景，陈焕、董祁达山水，汪退谷、张德天字袖，孙克弘花卉，王文治、陈洪绶、李藩塘、李兆洛楹联。第三室：铁琴铜剑楼之文徵明墨山水，董其昌墨山水，仇十洲三狮赫奕山水，蓝田叔墨石，徐天池墨荷，钱希仲、归昌世墨竹等。此外，如王铁珊之朱槲山水册一件；俞采生之陆师道墨笔猫石等六件；赵君閔之文徵仲青绿山水，江石如《晋爵图》，改七岁《善天女像》等十四件；丁芝孙之赵叔恒自题小像，王二痴、戴文节山水，王十洲兰花，何子贞小楷，萧汉文《登高唱和

入手，因为他认为口语是学好英文的关键。只重文法分析，不以口语为基础的人，必定讲不出也写不出平易自然、纯熟地道的英文。能够灵活运用平常的单词，才是学好英文的不二法门。

这段四百字的新闻报道写于六十年前，当年新加坡正筹建南洋大学，林语堂受聘担任首任校长，但后来由于诸多问题，他与南洋大学董事会不合，开学前即行离职。这则新闻报道虽然略显陈旧，然而其中所引述的观点至今看来依旧有其价值。

林语堂学贯中西，中英文的造詣均属上乘。1930年代起，他在美国陆续以英文出版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等重要著作，企图藉此让西方更了解中国。

他还在中国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文学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文学，在文的世界里一样影响巨大。难得的是，他在1930年代，还编著过一本《开明英文读本》，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成为全中国各中学通用之教材，畅销20年，为国人的英语学习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难怪1987年美国出版的权威大型词典《监查书屋英语大词典》第二版（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Unabridged）收录有Lin Yutang（林语堂）词条，称其为“中国作家及语文学家”（Chinese author and philologist），为八位收录其中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另七位为：巴金、冰心、丁玲、郭沫若、鲁迅、茅盾、沈从文）。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为了写出超越李白的诗篇，拥有神速般的强大技术的外星生物悍然采用了一种极端而蛮横的方式：把所有诗歌都写出来，也即把所有汉字一网打尽，按照古诗的格式进行排列组合，这样就穷尽了过去、未来的一切诗歌——那些超越李白的诗自然也包括在内。然而，这场“终极吟诗”完成后，当事人却发出了沮丧的呻吟：诗人的心灵感受是如此独特，即便掌握了穷其所有的“大数据”，也无法将那些超越李白的诗篇从中挑选出来。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

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写了论文》的报道引发众人关注。可想而知，“清华附小”、“小学生”、“大数据”等要素的组合，足以引发人们的好奇和艳羡，获得广泛关注也就不足为奇。师生家长的全情投入，十分令人感佩，毕竟，认真真地共同做好一件事，已很不容易。然而，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这一方法方向是否合理？第二，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这一教育行为是否合适？换言之，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

先看第一个问题，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

卷》，钱牧斋《楞严经疏稿》等三十卷，又扇册十页；宗子岱之史痴翁《白云女史像》，龚半千山水，成亲王仿宋人本康石舟美人等三十件，又唐大李将军《明皇御苑出游图》、岳忠武墨迹、翁覃溪书《自芳诗》、汤贞愍《秋风匹马图》等手卷四件；归经斋之沈南屏设色花卉、汉玉酒斗等十六件；王士升之摆王四件；张尚铭之仇实父人物；王瑞峰之吴渔山、王忘庵合璧轴，文徵明、沈石田山水等七件；美人卫尔生之英国古磁杯一只，德国古磁杯、盆各一只，美将磁像一个，百年前时表一只，古银器四件；沈百门之晋王献之《银钗帖》、明张君度山水轴等五件。其启事云有六百余件之多，分日陈列。”不过，那些藏家对自己的珍品也是非常爱惜的，拿出来略为展览几天便急着要拿回去。21日徐氏记：“晨抵城，至逍遥游吸茗，知书画展览会中，上品半已收回。茶散，至图书馆晤良士，阅视一周。良士嘱为照料。”这位“良士”，就是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瞿启甲。张元济与瞿良士是老朋友，也许就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展览会，便赶来了。徐氏22日记：

晨，至逍遥游吸茗。宗子戴等谓昨日书画会大为减色，张菊生等昨日至寓新旅社，今日如来观，须稍放精彩。乃约（丁）芝孙及余早到图书馆，实行审查，去中下驷而加列精品。有翁振甫所藏翁覃溪楷书《金刚经》，又明绣《十六应真像》，钱育纶所藏杨子鹤绘《山谷骑牛图》小像，瞿良士所藏蓝田叔雪景山水大幅，宗子戴所藏新罗山人《天山积雪》立轴，均是精品。观览者近五百人，惟张菊生以游山未来。夜，良士、子戴觞菊生于山景园，邀予作陪。



筆會

同来者高梦旦父子、陈叔通。予与菊生自壬辰在京师聚晤后，不见已三十年矣！面貌依稀可认。询星榆夫子后嗣，云两孙均在家，一庶生子尚存，亦不甚得意。回首师门，不禁叹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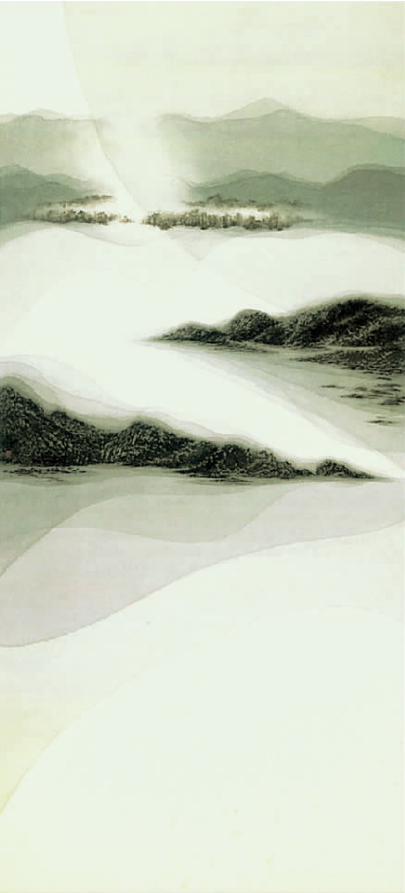
壬辰为1892年，是年张元济成进士，他们在北京相聚相识。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离京。星榆夫子姓张，名大任，是张元济的叔祖，也是他尊为“问业师”者；同时，也曾是徐兆玮的老师。回首往事，两位老进士感慨万千。第二天，张元济等人参观了这个赈灾书画展。23日徐氏日记：

晨，至逍遥游吸茗，张菊生、陈叔通等亦来。即与往图书馆观览。今日有邵息庵所藏之张止庵《待漏图》卷，及赵君閔所藏之黄尊古山水册，均精品。闭幕后，与映南、芝孙觞张菊生等于山景园。席间谈及同善社之秘密及波靡之众，始知唐蔚芝所设之国文专修馆系中事业。高梦旦言，京师同善社以汪伯棠为之魁，据云其老翁在四川，其徒党之盛颇足骇咤。北风微凉，席散即归。菊生云明晨乘早轮行。

张元济回沪后，肯定给瞿启甲、宗子戴等友人写过道谢信，可惜今均未见，仅见6月3日徐氏日记记录有张元济给徐氏的信：

张菊生五月卅一日函略言：曠违矩范，雁闌鱼疏，屈指几及廿年。辄假旅游之缘，得以重亲眷欵，既申夙眷，遂辱嘉招，醉饱之余，弥深感幸。归后尘冗如常，惟喜槩铅在怀，将勤补拙，仰承高雅，或可时邀清海，俾得频觴饥渴耳！

这封信虽然少了头尾，但非常珍贵，应该补充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里去。



流影系列之一、二

（水墨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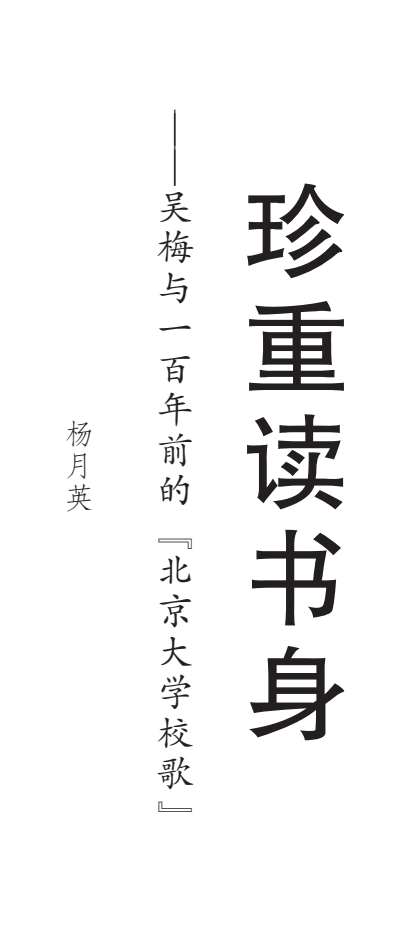
高杏娟

“大数据”无法触及诗词的本质

陈 慧

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实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传统诗教所包含的情感教育，应当在中小学阶段得到提倡。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对知识理性和思想品德的强调相当充分，而在感性启发方面则似有不足。就笔者在高校开展诗词教育的经验来看，不少大一新生在古典诗词面前或多或少地丧失了“感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急于展开的研究若非难令人信服，便是冷冰冰地欠缺生命的厚度。语言文字的隔阂固然是导致“感动”能力衰退的一个因素，情感上的疏离却更为关



吴梅与一百年前的《北京大学校歌》

杨月英

珍重读书身

过于冷静，与时代精神不相适应”，因此清末民初“昆剧事业进入了极度衰败的境地”。而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引领风气之先，在当时更不可能将这样一支风格极为“老古董”的昆曲清曲选为校歌。吴梅完全用昆曲的格律谱写北大校歌，实在是过于主观了，根本没有考虑过当时能够对这支校歌产生认同感的北大师生为数不多。这恐怕是吴梅对昆曲爱得极为深沉，以至于完全不顾及可行性的缘故。

吴梅是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的。传统上认为小说、戏曲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吴梅在高等学府开设曲学课程并亲自教唱昆曲，这不仅是一种创举，同时也很容易遭受非议。叶圣陶曾在作于1934年的《昆曲》一文中提及：“我又听说某一所大学里的‘曲学’一门功课，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简直就教唱昆曲，教台旁边坐着笛师，笛声嘘嘘地吹起来，教授先生跟学生就一同暖暖暖……地唱起来。告诉我的那位先生说这太不成话了，言下颇有点愤慨。”苗怀民《吴梅评传》中认为“这位‘教授先生’很可能就是指吴梅，因为当时能在课堂上教唱昆曲的教授并不多”。仅仅在大学课堂上教唱昆曲就使人感到“颇有点愤慨”，更何况是谱写昆曲曲牌作为校歌。我们现在觉得吴梅谱写的北大校歌风格古雅，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实际上这首歌与当时的氛围是格格不入的。

吴梅在《曲学通论》中区分各种宫调的不同，认为“正宫惆怅雄壮”，又在其《南北词简谱》中认为《锦缠道》的曲牌特点是“此曲音调至为悲壮，易施诸老生正末之口”。唐代张说有一句诗“鸛鸟峻立，哀玉扣清调”，用“哀玉”比喻曲声清越。吴梅谱写的这支《锦缠道》本身整体音调偏高，唱起来就带有这种壮怀激烈的气质。

整整一百年前，在民国初期混乱动荡的年代里，吴梅所作的北大校歌中有那样一种对读书的珍重与坚定，我偶然间读到歌词的时候很受感动。以前曾学过一点昆曲，于是试着把它唱出来。曲子旋律典雅，于清越的曲调中见出高朗的情怀，并且有一种明亮的光芒，让人坚信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读书更好、更值得珍重的事情了。一百年前如此，现在也同样如此。

伟大的诗人往往享乐过于常人，诗词又是对人类个体感恩与共通情怀的高度凝练。想要获得对诗词的深层理解，首先应该让自己能够“被感动”，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古人的情感世界，深切体会诗词的精妙所在与诗人的魅力所在。从古典诗词中获得对人类自身的感性认识，与诗词内外岁岁枯荣的自然生命发生共鸣，当从娃娃抓起。

小说《诗云》的结尾，不可一世的外星生物和细腻敏感的地球诗人最终达成了和解：诗人表达了对伟大的技术文明的由衷赞叹，天外来客则承认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本文并非持一种简单的“反技术论”，只是想强调技术方法与古典诗词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用大数据研究诗词，并非一无是处，但总归显得舍本逐末、买椟还珠。《庄子·天地》篇中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遮蔽。

（作者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